

紅太陽帝國的尖兵：

評介波形昭一編著

《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團體》

趙祐志

書名：《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團體》

編著者：波形昭一

出版書局：同文館出版株式會社

出版時地：東京，1997年3月

頁數：316頁

一、前言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面向世界發展，在此潮流誘導下，各色各樣的日本人民競相衝向海外，尋找發展的機會，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急先鋒，包括了大企業的海外派駐員、雜貨貿易商、商店老闆、店員、僱員、土木工、苦力、旅館業者、娼妓等各個階層，運用怎樣的研究方法，才能較清楚刻描這些移民的整體形貌，一直是學者所深思的。

1990年，木村健二¹在「歷史學研究會」的近代史部上，以「近代日本移民、殖民活動與中產階級」為題，發表報告，提倡包羅各類日本移民的海外經濟團體，是切入研究移民總體像的絕佳視角²。以此為契機，是年九月，木村健

1 木村健二，1950年生，現任東京農工大學留學生中心助教授，主要著作有《在朝日本人の社會史》（未來社，1989年）、《在外居留民の社會活動》，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⑤膨張する帝國の人流（岩波書店，1993年）等。

2 參見《歷史學研究》第613號（青木書店，1990年11月），頁135-143。

二、波形昭一³、山村睦夫⁴和柳澤遊⁵，共同組成「海外經濟團體史研究會」，不久，又邀請小林英夫⁶、幸野保典⁷、橋谷弘⁸、須永德武⁹、今泉裕美子¹⁰、堀本尚彥¹¹等專精日本企業對亞洲擴張、海外日本人史的學者參加。1991年，隨著研究地區、視角的擴大，再邀請從中國經濟史立場著眼，對日本商工會

-
- 3 波形昭一，1941年生，現任獨協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相關著作有：《日本植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5年）、《通商產業政策》第12卷（東京，通產省通商產業調查會，1993年）等。
 - 4 山村睦夫，1946年生，現任和光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相關著作有《滿州事變期における上海在留日本資本と排日運動——上海日本商工會議所を中心に》上、下，《和光經濟》第20卷第2、3號（1988年2、3月）、《近代企業の確立と國家》，藤井光男等編，《現代日本經營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91年）等。
 - 5 柳澤遊，1951年生，現任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相關著作有《貝原收藏日記——在華日本人實業家の社會史》（柏書房，1993年）、《神谷仙次郎——『滿州』土木請負業者の世代交替》，竹內常善等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企業家の諸系譜》，（大阪大學出版會，1996年）等。
 - 6 小林英夫，1943年生，現任駒澤大學經濟學部教授，相關著作有《「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壊》（御茶の水書房，1975年）、《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亞共榮圈」と軍票》（岩波書店，1993年）等。
 - 7 幸野保典，1949年生，現任文化中心阿里郎近現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相關著作有《1920年代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の分析》，《千葉史學》第11號（1989年）、《會社令の施行と會社設立狀況》，小林英夫編，《植民地への企業進出——朝鮮會社令の分析》（柏書房，1994年）等。
 - 8 橋谷弘，1955年生，現任東京經濟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相關著作有《1930年代前半期フィリピン對する日本の經濟的進出——アメリカ・フィリピンの對日政策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清水元編，《兩大戰間期日本・東南アジア關係の諸相》（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86年）、《釜山・仁川の形成》，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③ 植民地化と産業化》（岩波書店，1993年）等。
 - 9 須永德武，1956年生，現任日本大學經濟學部兼任講師，相關著作有《中國の通信支配と日米關係——三井・雙橋無線電臺借款とフエデラル借款をめぐって》，《經濟集志》第60卷第4號（1991年1月）、《臺灣銀行の中國資本輸出活動——自己資金單獨借款を中心として》，《土地制度史學》第138號（1993年1月）等。
 - 10 今泉裕美子，1963年生，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相關著作有《南洋群島委任統治政策の形成》，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④ 統合と支配の論理》（岩波書店，1993年）、《國際連盟での審査にみる南洋群島現地住民政策》，《歷史學研究》第665號（1994年11月）等。
 - 11 堀本尚彥，1965年生，現任日本放送協會國際放送局製作中心職員，相關著作有《上海の抗日運動と日本居留民——九一八事變前後を中心に》，《信大史學》第14號（1989年11月）、《シンガポール華人の抗日運動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近きに在りて》第22號（1992年11月）等。

議所史研究有相當成績的飯島涉¹²、塚瀨進¹³加入。

該會自1991年10月起，到1993年夏天止，共召開24次的研討會，他們由研究史回顧、編輯「海外經濟團體相關文獻資料目錄」入手，再以此為基礎交換心得，1993年4月，為出版研究成果做最後的「研究合宿」，此後即各自撰寫論文，至1997年3月，終於由波形昭一主編、出版本書。

「錢」、「物」、「人」為生產活動的三大要素，以往學者較偏重「資本」、「商品」的研究，而輕忽「人力」的討論。但自二次大戰之後，跨國企業急速成長，不僅「錢」、「物」在國際間迅捷流通，「人」也跨國地快速移動，近來，隨著「全球化」發展、冷戰局勢崩解，「人」較往昔更能突破國家的障壁，大量、活潑的流動，「人」的重要性，已可與「錢」、「物」等量齊觀；再者，「人」的移動，不僅是「經濟摩擦」，也是「文化摩擦」，故「人」移動所引發的摩擦，遠比「錢」、「物」的流動更複雜，因此，在上述背景下，「人」的移動已漸成日本經濟史學界研究的新焦點，各學會、大學陸續召開多次學術會議¹⁴，職是之故，筆者願就閱讀本書所見，試予評介，俾供參考。

二、內容介紹

本書除序論及跋外，共分為四部份、十二章、四十一節，各章依次為：

第一部份 殖民地、託管地的日本人經濟團體

第一章 臺灣經濟團體的形成與商業會議所設立問題（波形昭一）

第二章 朝鮮商業會議所聯合會的決議事項（木村健二）

-
- 12 飯島涉，1960年生，現任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相關著作有〈東京商業會議所和中國——從甲午戰爭到第一次大戰中心〉，張玉法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商業會議所資料』について——『商業會議所資料』の利用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會，〈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集（1992年7月）等。
- 13 塚瀨進，1962年生，現任中央大學文學部兼任講師，相關著作有〈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論文目錄〉（龍溪書舍，1990年）、〈中國近代東北經濟史研究——鐵路敷設と中國經濟の變化〉（東方書店，1993年）等。
- 14 重要的研討會至少有：1981年社會經濟史學會的「世界資本主義與亞細亞移民」、1982年龍谷大學的「海外日本人——移住・文化改變・企業活動」、1985年アジア經濟研究所的「戰前日本人對東南亞的入侵」、1985年社會經濟史學會的「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地」、1988年歷史學研究會的「由人的移動看歷史」、1990年歷史學研究會的「近代世界的移民與國家統合」等。

第三章	塞班島的南洋興發股份公司與社會團體	(今泉裕美子)
第二部份	中國的日本人經濟團體	
第四章	滿州商業會議所聯合會的活動	(柳澤遊)
第五章	奉天的日本商人與奉天商業會議所	(塚瀨進)
第六章	天津居留民團的低利貸款請願運動	(幸野保典)
第七章	上海日本人實業協會與居留民社會	(山村睦夫)
第八章	香港——日本關係中的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	(飯島涉)
第三部份	東南亞的日本人經濟團體	
第九章	東南亞的日本人會與日本人商業會議所	(橋谷弘)
第十章	新加坡的華人抗日運動與日本人的經濟團體	(堀本尙彥)
第十一章	泰國日本人社會經濟團體的活動	(小林英夫)
第四部份	亞洲情報網絡與經濟團體	
第十二章	商業會議所的亞洲經濟情報網絡	(須永德武)

綜結本書論述的軸心，主要有三：

(一) 日本政府與日本商人的關係

本書指出「官民接近」、「官方統制」是戰前日本向亞洲經濟侵略的重要特徵，這可分為「日人經濟團體配合日本政府」和「日本政府支援日人經濟團體」兩方面來討論。

(1) 日人經濟團體配合日本政府

首先，就設立目的言，在亞洲的日人經濟團體，經常是為了配合日本國策而成立的，例如：1910年代朝鮮、滿洲兩地的商業會議所，為響應「滿鮮一體政策」的號召，特別創立了「滿鮮商業會議所聯合會」（詳見第二、四章）；又如：1930年代以後，在泰國的日人經濟團體，也深受「南進政策」的影響，不論是1936年創設的「暹羅日本商工會議所」，或是1942年成立的「泰國日本人貿易會」，都軍事色彩十分濃厚（詳見第十一章）；再如：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和東南亞的日人經濟團體，也都是為了順遂「統制經濟」的運作而設立的（詳見第八、九章）。

其次，就活動內容言，在亞洲的日人經濟團體，不僅分擔了使館的部份業

務，例如：東南亞的日本人會，代辦出生、死亡證明、歸國手續、護照的申請（詳見第九章），甚至各地的商業會議所，也與日本帝國的擴張互為表裏，配合蒐集帝國所需的各種情報，對於日本政府經濟、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詳見第十二章）。

再者，就會員組成言，在亞洲的日人經濟團體，也多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以臺北為例，1898年創立的「臺北商業會」，其會員若非軍用品的雜貨商，即是軍方、總督府僱員的轉業者，他們配合帝國的軍事擴張，對臺灣展開經濟侵略；1903年設立的「臺北商工談話會」，成員轉為在臺的日人鉅商和財閥分公司幹部，其與總督府關係密切，擁有強大的建言權（詳見第一章）。又如：東南亞在1930年代以後，日本駐外使館官員更開始兼任各經濟團體的幹部，徹底統制各經濟團體（詳見第九章）。

(2) 日本政府支援日人經濟團體

首先，就資金挹注言，這可分為提供低利貸款和補助金兩種，前者如：1920年代末期，天津日商遭遇「濟南事件」抵制日貨的危機，亟需低利貸款渡過難關，最初正金、朝鮮、第一生命保險等金融機構不願貸款，但日本政府為確保侵略中國的基地，乃向第一生命保險施壓，終於使天津日商獲得三十萬銀元的貸款（詳見第六章）；後者如：1930年代以後，日本外務省即透過補助金，積極援助東南亞的日人經濟團體（詳見第九、十一章）。

其次，就情報支援言，一次大戰前後，日人商業會議所有四分之三的海外經濟情報來自外務省、農商省，並且透過領事館——外務省通商局——地方政府——商工會議所傳播，顯現商業會議所的經濟情報網絡，具有濃厚「官民一體」的特性（詳見第十二章）。

尤其，當遭逢抵制日貨危機時，更常能將日人官商關係催化至最高點，例如：1928年，在新加坡華人抵制日貨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日商為突破銷售網絡被華商壟斷的困境，並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雙方合力加強「官民合一」體制，將商工省貿易局、南洋協會、各地商工會議所、商品陳列館、地方政府、各種協會、經濟團體聯成一氣，有效地化解了部份抵制日貨的危機（詳見第十章）。

但日本政府和日人經濟團體之間，有時也有若干歧見，以臺灣之例言，臺北

的日商雖從1900年代起即倡議設置商業（工）會議所，但總督府顧慮臺商實力雄厚，即使有納稅額的限制，也無法使日商在會員、議員數上獲得優勢，在難以貫徹「差別待遇」的原則下，始終反對設置商（工）業會議所（詳見第一章）。

再以日商情報網的建構言，1919年，商業會議所為加速經濟情報流通的速度，曾請求可與駐外使館直接通信，但遭日本政府以徒增領事館負擔為由拒絕（詳見第十二章）。

塞班島則是一個日本政府與日人經濟團體對立的特例，當地由於被「南洋興發公司」以製糖業托辣斯壟斷利益，琉球籍的商人、佃農、勞工不得已組織「縣人會」、「振興會」，進行罷工等抗議活動，並將南洋群島統治不良的情況傳播出去，以爭取琉球籍日本人的權益，另一方面，南洋廳政府、南洋興發公司也扶持「邦人會」、「共和會」，與之對抗，但在日本民間輿論及國際聯盟的壓力下，終於迫使日本政府命令南洋廳、南洋興發公司改善，由此也可顯見日本政府對琉球人的歧視（詳見第三章）。

（二）日本商人與日本商人之間的關係

日本商人雖然向以團結著稱，但也常因規模大小、地方不同、時間先後等影響，而有不同利益，甚至爆發衝突。

（1）大、小日商的衝突

這尤以上海日商和中國其他各地日商對排華運動態度的迥異，表現得最清楚。在滬的日商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日本財閥的分公司，他們多從事對外或對華貿易，也稱為「公司派」；二是以華人為顧客的雜貨商或製造業者；三是「虹口商人」，他們多是以日人為顧客的零售商。由於前兩者的人數佔六成以上，因此，上海日商的利益與華人關係密切；再者，因「公司派」實力雄厚，故在滬無論「居留民團」或「實業協會」，都由其掌控。

1915年，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引發抵制日貨運動，但影響僅限於中小日商，因此，以大商人為主的「實業協會」，只採取「注意性的觀望」，甚至籌組「日華實業協會」，積極推動對華親善。1923年，又因「旅大歸還問題」，爆發杯葛日貨運動，本次排日雖較前更為激烈，上海日商的強硬派也曾一度抬頭，但商業會議所的成員畢竟多為大企業，根基穩固，影響較小，故仍主張

對華採取謹慎的態度，「日華實業協會」更堅持親善政策不變（詳見第七章）。

1927年，再因「濟南事件」，引發抵制日貨運動，對此，以中小日商為核心的「天津商業會議所」，和由紡織業鉅商掌控的「上海商業會議」，態度也天壤有別。天津日商主張召開「全華居留民團、商業會議所聯合會」，以強硬手段對付；上海日商則因貿易對象多為華人，反對魯莽行動，結果在上海的壓抑下，天津的提議乃胎死腹中（詳見第六章）。

此外，新加坡大、小日商分別成立商會也是著例。1928年，新加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中小日商嚴重受創，不僅銷貨減少三成，同時也開始缺乏資金，但「日本人實業協會」卻居於大商人的立場，對中小商人的金融問題敷衍應付，因此，中小日商憤而另組「日本人實業同志會」（詳見第十章）。

(2) 不同地方日商的對抗

不同地方的日商，因經濟環境差異、利益衝突，也常發生對抗，例如：「滿鮮商業會議所聯合會」，自1918年首次召開起，即分成大連、奉天兩個集團互爭主導權，第一屆聯合會以大連集團較佔優勢，但第二屆聯合會奉天即聯合安東、朝鮮的商業會議所，打倒「大連中心主義」。第三屆聯合會大連商業會議所認為「滿鮮一體」將惡化日華情感，妨礙其商業利益，因此，對「滿鮮一體」政策抱持消極態度，但此時由主張「滿鮮合作」的奉天集團居領導地位，故大連集團的意見不斷受到壓抑。一次大戰後，由於主張「滿鮮合一」的寺內內閣倒臺、大連經濟急速成長、朝鮮銀行入侵滿洲失敗等因素影響，增強了大連集團的力量，兩度延會的「滿洲商業會議所聯合會」，終於能在1922年召開，實現了大連商業會議所「滿州」本位的主張（詳見第四章）。

又如：奉天日商主要分佈在「城內·商埠」和「滿鐵附屬地」兩區，前者以華人為主要顧客，多為貿易·批發商，後者則以日人為主要顧客，多為食品·雜貨商，兩地日商由於經濟環境不同，看法也頗有差異。1920年代時，城內日商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取得銀本位的貨幣、奉天票暴跌、張作霖政府不當課稅、上海棉貨爭食市場等；滿鐵附屬地日商的主要問題則是：「滿鐵消費組合」搶奪日人顧客、華商入侵等。對於排日運動，兩地日商意見也不相同，由於排日運動主要發生於城內，因此，請願鎮壓排日運動者多為城內日商（詳見第五章）。

此外，不同地方的商業會議所，由於貿易結構的差異，所重視的經濟情報也有差別，例如：「東京商業會議所」以生絲情報較為重要，「大阪商業會議所」則較看重棉貨情報，而「名古屋商業會議所」卻以陶瓷器情報為主（詳見第十二章）。

(3)新、舊日商的對立

例如：1898年，臺北「商業會」與「商工會」經常發生對立，其原因之一就是：前者先來臺北而後者晚到所致（詳見第一章）。

(三)日本商人與土著商人之間的關係

日本商人在帝國軍事力量的保護傘下，發動經濟侵略，因此，常與土著商人之間，存在著劍拔弩張的競爭關係；而土著商人也經常打著反侵略的旗幟，發動杯葛日貨運動，反制日本商人的經濟侵略。

(1)日本商人與土著商人的競爭力

以往眾人憑空想像，總以為：亞洲各地的土著商人面對日本商人的經濟入侵，全無反擊之力，只能任由日本商人宰割，但根據本書的研究，事實卻非如此，日商只在朝鮮佔居優勢，其他在臺灣、東北、華北、東南亞、香港的競爭力，都不敵華商。

在朝鮮，韓國商人面對日商日益沈重的入侵壓力，不得不與日商交涉，在1916年成立九個日朝商人合組的商業會議所，並於1918年設立「朝鮮商業聯合會」，但就會員人數言，朝鮮商人僅有日本商人的一半，幹部人數更只有日本商人的四分之一，因此，在朝鮮，日本商人顯然佔居優勢，朝鮮商人無法在各地的商業會議所和聯合會中，爭取自身的利益（詳見第二章）。

在臺灣，總督府始終反對日商設立商業會議所的請願，係因臺灣商人實力雄厚，成立商業會議所後，臺商無論在會員、議員上都將佔居多數，不僅難以掌控，也將損害日商的利益（詳見第一章）。

在東北，居住在滿鐵附屬地的日商，在華商入侵的壓力下，被迫成立「商店協會」、「輸入組合」，以求對抗；但其後仍不敵華商的競爭，於是支持發動「滿洲事變」，以謀救濟（詳見第五章）。在華北，天津的中小日商，同樣也是因為華商的陸續侵入，使得其營業狀況日益惡化（詳見第六章）。

在東南亞，本書指出：日商的經濟入侵，雖比華商更有計畫，但華商利用地緣、血緣關係，在東南亞所建立的商業網絡，是日本商人經濟入侵東南亞的最大障礙（詳見第十章）。

在香港，日商受挫，主要係因粵商壟斷了海產、棉貨的貿易網絡。在海產方面，粵商掌握了橫濱、神戶的輸出網絡，函館商人雖力圖打破，終究失敗。在棉貨方面，一次大戰後，日商以價格低廉為武器，開始入侵香港市場，但1928年因「濟南事件」，引起排日運動，日本棉貨輸港銳減；1930年代雖在日商積極努力下，日本棉貨再度大舉入侵，但粵商影響力仍大，神戶四成的日本棉貨，必須透過粵商的「輸出協會」，才能進入香港。而且此時，華商又成立華商總會、各種同業公會、同鄉會，商業網絡日益強固，日商甚難打入。日商在無法擊敗粵商的情況下，對華南的經濟入侵，與滿洲、華北、上海相比，成果相當有限，基於此，日人「北進」的動機，即是為了避開華南華商強勁的商業網絡（詳見第八章）。

(2) 抵制日貨運動的影響

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無力進行軍事報復，但華商經常趁反日民氣可用，發動抵制日貨運動，給予日商沉重打擊，例如：1928年濟南事件爆發，華商趁機發動抵制日貨運動，重挫天津、香港日商（詳見第六、八章）。又如：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泰國華商在中華總商會的指導下，發動抵制日貨運動，日貨只有棉布勉強仍能透過印度商人銷售，打擊甚大（詳見第十一章）

但在抵制日貨的危機中，日商也會調整體質，強化競爭力，例如：1928年濟南事變後，新加坡爆發大規模抵制日貨運動，華商總會號召對日經濟絕交，發起「促進中國商品運動」，並加強與中國政府聯繫；中國政府受到激勵，也成立全國商業聯合會、爭取關稅自主、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在排日運動中，南洋華商、中國政府逐漸合力整備出組織性的體制，與日商經濟競爭。在此壓力下，日商為建立自己的銷貨網絡，乃加強「官民一體」的體制，此後華商雖仍在棉布、雜貨方面佔居優勢，但日商也建立了玻璃製品、陶瓷器的商業網絡，有效化解了部份抵制日貨運動的危機，並增強日貨的競爭力（詳見第十章）。

三、內容評論

本書內容的大要已如前述，以下再就本書研究所包含的範圍、視角、論點、圖表、參考資料等，加以評論。

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論述所涵括的地區、時間、團體豐富而多樣（參見表一）。在地區上，本書包括了殖民地、託管地的臺灣、朝鮮、塞班島，中國的大連、奉天、天津、上海、香港，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日本的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相當周全，但可惜的是，在殖民地上少了樺太，在中國方面欠缺內陸都市，而且第一、四章以臺灣、滿洲為標題，但卻僅討論臺北、大連。

表一：各章所述的時間、地區、團體

	地 區	年 代	經 濟 社 會 團 體
第 1 章	臺 北	1895~1909	商業會、商工會
第 2 章	朝 鮮	1901~1927	商業會議所
第 3 章	塞 班	1920S'~1930S'初	振興會、縣人會
第 4 章	大 連	1910S'~1920S'初	商業會議所
第 5 章	奉 天	1903~1930	商業會議所
第 6 章	天 津	1920S'末~1930S'初	居留民團
第 7 章	上 海	1903~1920S'前半	實業協會、商業會議所
第 8 章	香 港	1886~1930S'末	日本人會、商工會議所
第 9 章	東 南 亞	1914~1939	日本人會、商工會議所
第10章	新 加 坡	1928	實業協會、實業同志會
第11章	泰 國	1919~1945	日本人會、商工會議所貿易會
第12章	東京、大阪 名古屋	一次大戰期間	商業會議所

在時間上，本書各章所述的時段，從十九世紀末到 1945 年都有，同時也討論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一次大戰、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等時點，對各地日商發展的重要性，似乎隱約指出：日商係配合帝國軍事擴張，向亞洲經濟入侵，但可惜的是，各章所述的時段差異頗大，不僅無從比較各地日人經濟團體的發展趨勢，也難以討論同時段其間的相互關係。

在團體上，本書討論的經濟團體，包括了「商業（工）會議所」、「實業協會」、「商工會」、「商業會」、「貿易會」、「實業同志會」等，社會團體則有「日本人會」、「居留民團」、「縣人會」、「振興會」等，頗為豐富，但可惜的是，各類團體性質差異頗大，因此，甚難比較特色，再者，一地常並存多種團體，例如：天津即同時有「居留民團」、「商業會議所」，但本書只討論「居留民團」，若能多種團體一併論述，則更能瞭解這些團體所扮演的角色。

本書另一值得稱述的地方，即是開拓了許多研究的新視角、新論點，例如：第五章強調奉天當地的經濟環境，對不同性質的日商，造成不同的影響，各類日商各有其利害，不能籠統地一概視之；第六、七章指出上海日人鉅商和其他在華中小日商，因貿易對象有別，利益也有差異，故對排日運動的態度軟硬也不一致；第八章認為香港在地的經濟網絡，對日商造成了限制，粵商強勁難以擊敗的商業網絡，是日人北進較積極、南進較退縮的經濟背景因素；第十二章突破以往只重官方情報網絡研究的情況，另闢研究民間情報網絡的途徑等。

但本書的研究視角也還有若干不足之處，首先，本書既指出「官民一體」是日商向亞洲經濟侵略的重要特徵，但卻僅簡略談及官方曾給予經費補助、情報支援而已，至於官方的實際政策或行動，著墨仍十分有限。其次，編者在序論中強調「人」的移動，不僅會造成「經濟摩擦」，也會導致「文化摩擦」，但本書各章仍僅重前者的研究，對於後者幾乎未有討論。再者，日人經濟團體與土著商人經濟團體的互動¹⁵、日人經濟團體所扮演的侵略、破壞角色，論述亦嫌不足。

至於研究論點方面，筆者認為有一處有待商榷，即第八章飯島主張由於華南華商的商業網絡過於強勁，使得日人為了避開華南難以突破的商業網絡，轉而北

15 戰前臺灣的台、日人商會互動，可參考趙祐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

進。筆者認為此係過分推論，因為華北華商也有強勁的商業網絡，本書第五、六章即言東北、華北的日商也多不敵華商的競爭，再者，即使能夠侵入，中小日商的顧客亦以日人居多，與華商的商業網絡關係不大。

在圖表方面，本書共有表四十三個、圖四個，尚稱豐富，但可惜的是，圖文相互配合的解釋稍嫌薄弱。在參考資料方面，本書引用戰前的外務省檔案、領事報告、通商彙報、統計資料、各經濟團體的會議記錄、月報、會報、事業成績報告、財產調查、會員名簿、會則、報紙、年鑑、要覽、商工名錄等，戰後的專著、論文、紀念誌、回憶錄、私人傳記等，十分多元可觀，但可惜的是，甚少使用中、韓、英文的資料，顯見本書較少參考當地人的觀點。

此外，第九、十一章多以片假名拼譯東南亞的地名，若能將英文地名附上，則較不易混淆。再者，第六章頁一四二中，敘述因「濟南事件」爆發排日運動，對於天津的日本居留民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天津總商會、總工會、學生為中心，組成天津特別市反日會……，但「濟南事件」係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發生，因此，文中的「一九二七年」似應改為「一九二八年」，同理，該頁中，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天津銀行召開臨時總會，也應改為一九二八年。又第八章頁一九六，指陳華南五港有福州、廈門、汕頭、廣東及香港，其中，「廣東」似應改為「廣州」。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本書也插述了臺灣在日人經濟團體活動中的若干動向，頗值得注意，例如：第三章中論述臺灣經驗對塞班島發展製糖業的貢獻，指出：1920年代南洋廳政府所扶植的「南洋興發公司」係結合朝鮮「東拓」的資金、琉球的勞力、臺灣的技術而成，該公司聘用「臺灣新高製糖」的常務董事松江春次，規劃發展方向，松江參考臺灣經驗為藍本，主張勞力供應應以佃作制度為中心。

又如：第八章中敘述臺灣人在華南五港的活動，指出：1907、17、27年，臺灣人在華南五港的總數，共有1,876、3,777、7,931人之多，並且在廈門設有「臺灣公會」、「旭瀛書院」，臺灣人所經營的商店共有二十七家，在外人開設的商店中，數量高居第一位。

再如：第十一章中簡述1910年代臺灣銀行在東南亞的仰光、巴達維亞、曼谷建立分行的過程；並指出1933、34、35年臺灣在泰國的人數，分別有71、

76、89人，佔日本人（包括臺灣人、朝鮮人）在泰國總數的15～17%；又指出：臺灣人在泰國，主要從事茶葉貿易，最重要的貿易商是張春木開設的「東源洋行」，主要經營雜貨、食品、牛皮貿易等；而1940年「在泰日本人會」出身臺灣者計有34人，佔會員總數269人的12.6%，就出身縣別言，甚至較東京的31人還多，顯見臺灣在南進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

又如：第十二章中也插述一次大戰前後臺灣商業團體，在日商經濟情報網中的活動，指出：臺灣商工組合、臺北商工會、臺南商工組合、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等團體，與名古屋商業會議所定期交換刊物，並透過大阪商業會議所，進行209件的貿易仲介。

綜觀本書，能集各方專家，廣泛討論日人在亞洲的各種經濟團體，不僅內容包納了商人團體研究的重要主題，並且論點新穎、參考資料絢富，堪稱商業史的上乘著作，值得一讀！